

□惟寅

来自田野大地的见闻

2005年为配合浙赣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,郑嘉励在浙江龙游县湖镇寺底袁村发掘古代墓地,当地记者来采访,对发掘成果的介绍并不十分在意,问题全是挖出了何种宝贝,哪件文物最贵、值多少钱等。郑嘉励说,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是抢国家的文化遗产,考古工作是为了还原古代社会生产、生活的种种细节。记者翻看郑嘉励的手写工作笔记,郑嘉励经常会写繁体字,“这是个人习惯,无所谓好坏对错”。

第二天,报纸出来了,说在龙游发掘的考古工作者,年纪并不很大,却一手繁体字。“言下之意,考古之人,入戏太深,已与时代脱节,不知今夕何夕。”郑嘉励自嘲道。这件事说明了公众对考古常见的几种误解:一、考古是挖宝的;二、考古人近于古董商,至少对市场行情有相当了解;三、考古人是老气的,至少与时尚相当隔膜。想要消除这些误解,考古工作者主动向公众敞开心扉是很好的做法。

郑嘉励从事考古专业之初就开始写一点杂文。2001年后,他认为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业务上,于是长年奔波于田野,先是做瓷窑址考古,后来从事宋代墓葬和城市的调查、发掘与研究,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之余,偶尔也写一点学术论文。

田野考古工作者不同于一般的“书斋学者”,从考古项目的申请、青苗费的补偿、农民工工资的谈判、与老百姓的相处、与所在地文物干部的合作、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、与工程建设方的冲突和妥协,到考古发掘的业务本身和后期的文物保护,工作千头万绪,一名能够胜任前述事务的考古人,其身份确实介于基层乡镇干部、包工头、野行者和人文学者之间。

几十年的考古工作,辛苦是难免的,积累也很可观。除去发现的艰辛和喜悦,光是考古工作中的人际关系、工作协调所带来的经验与感受,就已足够多姿多彩。尽管郑嘉励深知,随着学科发展,考古行业更加专业化,对大多数的“考古工程师”和“考古科学家”而言,那些个人化的感慨、体验和情绪,是被视为“科学性”的冲突因素而不登大雅之堂的。然而,他始终认为考古报告、学术论文这几种文体,无法全面反映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生活。考古人是“有生活”的群体,如果只撰写报告或论文,而摒弃了田野中曾经感动过自己的见闻,摒弃了对人生、社会和历史的体悟,岂非“捡了芝麻,丢了西瓜”。

基于这些认识,2009年,郑嘉励重新开始写作杂文,《考古四记》就是他多年文章的荟萃。书中所收文章,大致分为四类:“考古记”篇,是他参与过的考古发掘项目的记录,当然是个人化的记录文本;“田野记”篇,是田野调查中的见闻和思考,有点学术考察报告的面貌,然其底色,终归是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;“历史记”篇,有的是读史、观展札记,融入个人的考古工作经验,有的是学术论文,只不过写成自己喜欢的格式;“人生记”篇,以淡笔写浓情,追忆工作中难以忘怀的人和事。

《考古四记·田野中的历史人生》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“网红考古学家”郑嘉励的作品。这是一部有温度的考古笔记,作者以兼具感性气息与田野调查笔记的理性笔调,呈现了其20多年在田野大地上的求索与探寻之旅。这些朴素、真诚、热烈的文字,寄寓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考古工作的热情,试图在考古工作者与公众之间建立起知识、趣味、情感和思想的联结。

郑嘉励: 愿做考古人生的讲述者

这组文字,在内容上,如果有一个人共同的主题,那就是都来自田野大地,郑嘉励尝试将田野、考古、读书、历史、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整合起来,揭示文物考古与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的关联性,以证明考古事业与多数人的情感、趣味和思想有关。

拿锄头的读书人

郑嘉励念高中时成绩很好,否则念不了考古学专业。当时,国内设有考古专业的大学不多,通常就是顶尖的几所综合性大学。高中时,他的数理化成绩也不太坏,却依然选择文科,因为对文史确有兴趣,对考古并无了解。

郑嘉励的大学志愿全是历史学,却被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录取,这是此前不曾想到的。老师安慰说,考古与史学是兄弟学科。其实,现代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,与扎根文献的传统史学很不相同。

大学里的考古专业课,大概按时代先后编排,先教旧石器,然后依次为新石器、商周、秦汉直至宋元考古,明清两代距今不远,一

般不作为考古的对象。课堂上,听到的不是元谋人,就是北京人,不是夹砂红陶,就是泥质灰陶,动辄距今几万几千年。“如此专门的学问,对一位毫无准备的学生,是无趣的。我至今对石器时代兴趣寥寥,可能是当年被吓着了。”

郑嘉励对考古的兴趣萌发于考古实习期间。大学三年级,他去江西樟树、四川万县(今重庆万州)实习,在樟树发掘一处商代遗址,在万县抢救一批汉六朝墓葬。

在他看来,考古学科实践性强,好比跟人介绍唐代瓷器的特征,口说无凭,讲得天花乱坠,别人也不明白。若让学生面对实物,上手观摩,辅以指点,只要不太过愚顽,就容易有所认识,说明实践是最重要的学习。郑嘉励在实习中的收获,不限于对坛坛罐罐的直观认识,重要的是明白了考古工作的方法。课堂上的道理,过去不明白,在工地上竟能豁然明晰起来。田野工作最大的好处,是付出就有收获,而且总能遇到新鲜的人事。

1995年,郑嘉励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成为职业的考古工作者,直至今天。考古工作,

要坚持在野外第一线。农村的物质条件不及都市,不免风吹日晒,也不免手拿锄头面朝黄土,有时的确是辛苦的。不过,他认为:“只要不对物质有过高的欲求,一份衣食无忧的工作,且为个人兴趣所系,大概也能接受。”

任何人如果对事业并不真正出于热爱,始终保持激情,绝非易事。保持工作激情,需要好心态,也需要些许闲情逸致。有一次郑嘉励在浙南某地考古调查,头顶烈日翻山越岭。路上不时有老乡热心指路,举步维艰之时,忽然看到路旁的一座路亭,附近恰好又有一口水井,一冽清泉正汩汩而出,不由得让他感慨无处不在的人间温情。“类似事例,所在皆有,只存乎有心人的发现,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跋涉有多辛苦。生活的本质,大同小异,看生活的角度,人人不同。但愿我能早日走出中年危机,重新唤回工作激情。”

考古人的底子,毕竟是读书人,但与伏案书斋的书生不同,是手拿锄头“动手动脚找东西”的书生。母亲揶揄他说,读这么多年书,还不是跟她一样,照样拿锄头。

“透物见人”的学问

考古是发掘、整理、研究古人的遗迹和遗物的学问。古人的遗址、墓葬及其遗物,其物理形态客观存在,考古工作者理应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界那样,采用地质学、动物学、植物学、同位素、C-14测年学等科技手段来发掘、整理、分析考古材料。近年来,考古学有越来越明显的自然科学化倾向,甚至有工程科学化的发展趋势,因为考古遗址的测绘、建模、复原、展示的要求越来越高。

自然科学、工程科学手段的广泛介入是合理的,有其积极意义。今人因此获知更多的关于古代的“硬知识”,在古遗址中提炼的信息越来越多,对古建筑的测绘和复原越来越精确。追求真理的科学,讲究客观、准确,必然要求从业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,犹如地质学家面对一块石头、医学家面对人体某个器官的态度。

但是郑嘉励认为,考古学不等于物质文化研究,更是“透物见人”的学问,发掘和研究墓葬、遗址,是为了认识人类的行为模式、思想观念以及人类社会的演进模式。具体而言,旧石器考古涉及古环境、古生物、人类进化史,可能更多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;新石器考古,固然采用大量自然科学手段,应该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;而历史时期考古,尤其是汉唐宋元考古,属于历史学范畴。

在“术”的层面,即技术层面,考古学具有自然科学、工程科学的属性;在“道”的层面,考古学则属于人文社会学科范畴,历史时期考古必然是人文学科。郑嘉励认为,既为人文科学,它就不只是纯客观的知识追求。在生产新知识以外,更要增加社会福祉,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,提升个人的人生境界。孔子说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”,考古学除了“为人”的科学属性,也是致力于自我完善的“为己”的人文学。

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毕竟是人和社会,不像物理学、化学那样具有稳定的客观性。郑嘉励直言,即使把河姆渡文化的复原研究做到绝对准确,那也是“无用之学”,无法转化为生产力,除非大家愿意回到7000年前,过河姆渡人那种茹毛饮血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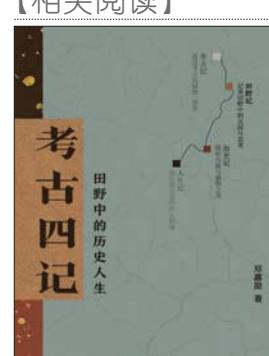
在大型基建中,在轰鸣的推土机前,考古人发掘古遗址、古墓葬,艰苦卓绝,为国家抢救了大量文物。但有关考古发现的报道,有时会招致很多批评。网络“喷子”固然无须理会,但有很多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不理解考古工作。为什么?

郑嘉励觉得,除了没有把“保护第一”和“科学发掘”的理念宣传阐述好,还有个原因就是未能处理好科学与人文的关系,只强调考古发现的意义、学术价值、文物的精美,很少考虑到古墓葬的主人。“即便是千百年前的古人,他们也应该是有尊严的人。”

人文关怀,不是抽象的,具体来说就是指对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注。不论现代人,还是古代人,都有人生真实的喜悦和困境,他们的生命都应该被尊重。人文关怀,不仅关乎学科形象,从写作的技术和修辞的角度上说,也是讲好考古故事的必然要求。这正是郑嘉励愿意通过文字,主动与公众对话的原因。

(作者为书评人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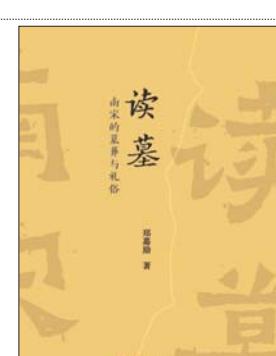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考古四记:田野中的历史人生》
郑嘉励 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《考古者说》
郑嘉励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《读墓:南宋的墓葬与礼俗》
郑嘉励 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